激励一生的一次学习

□袁晓江

学习改变人生，这句话如果用在我身上，真是恰如其分。这次学习在中央党校，时间是 1992 年。

难得机遇

1992 年下半年，我参加中央党校科研管理培训班，学员是全国各省市区、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党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当时我是湖南省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据中央党校科研部的同志介绍，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次举办科研管理培训班，因此同学们经常自豪地称自己是“黄埔一期”。第二期到了 2007 年，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对于许多同学来说，这次学习可能是众多培训活动中很平常的一次。但对我来说，却是终生难忘、影响一生的一次学习。我们这批同学有 50 多人，20 年过去了，目前还在党校科研管理岗位的只有三人，我是其中一个。其他两位分别是：河北省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唐凤朝、新疆党校科研处处长李西琴。1994 年我从湖南调到深圳工作，仍然是在党校，而且还是担任科研处处长，后来任职校委委员，分工也是科研管理工作。

1986 年我从岳阳市委党校调到湖南省委党校工作。当时党校的教学已步入正轨，教学管理机构及进修部、培训部、理论部、学员部等都建立起来。但科研及科研管理相对滞后。上世纪 80 年代中初期湖南省委党校还没有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1988 年在理论研究室设立科研管理组，我是首任负责人，当时没有科研管理经历，对科研管理几乎一无所知。领导找我谈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尽管只是一个副科长，但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任职，特别是领导这么看重，我表示决不辜负校委的期望。两年后即 1990 年湖南省委党校成立科研处，与理论研究室“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91 年我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兼科研处副处长，这年我 31 岁，正是风华正茂、活力奔放的年龄。

我很喜欢党校的工作环境，喜欢党校的教学和科研。科研与科研管理只有半步之遥，从搞科研到搞科研管理，并不太困难。与一般的行政岗位不同，科研管理属于半行政半学术岗位，对专业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不少党校都是选派专业水平较高、行政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科研处长。

由于刚接触科研管理，既好奇，又有干劲。但毕竟是一名科研管理的新兵，尽管有许多想法，但总感力不从心，无从下手。当时经常想，如果有一次学习培训的机会，那就太好了。正在这时，中央党校决定开办科研管理培训班，我接到通知后真是喜出望外。也许这就是命运，当我最需要学习的时候，培训班来了，而且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目标。我参加工作后，参加过无数次学习培训，包括国外的学习培训，但再没有像中央党校这一次那样刻骨铭心。

紧张学习

当我走进校园时，深切感受到中央党校对首届科研管理班的重视和关切。我们住的 25 楼与省部干部楼邻近，处在校园的中心位置，房间带有卫生间，当时其他学员楼都是公用卫生间。中央党校科研部作为这个班的主管部门，更是精心策划，全力组织，倾注了大量心血。时任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后升任副校长的刘海藩教授亲自挂帅；科研部副主任陈登才教授担任班主任；科研部其他同志经常到班上与大家一起学习，为大家提供服务。按照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制度，我们组建了班党支部，我是支部委员，负责学习。

我们这个班专业性很强，主要是以学习和研究科研管理为主，但也安排了其他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央党校的学习真可谓丰富多彩，高潮迭起。我们最喜爱的是每星期一次的大课，主讲人都是中央领导或是中央国家部委的主要领导，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等，都亲自为我们授课。这些课立意很高，视野开阔，材料扎实。我们在地方工作，很难面对面聆听这么多高层领导授课，同学们确实大开眼界。有一次大课是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徐寅生在大礼堂讲中国乒乓球事业和乒乓球外交，与他同来的还有几位乒乓巨星。在讲课中间，工作人员将乒乓球桌搬到舞台中央，徐寅生与运动员们一边挥拍打球，一边讲课。这种讲课方法是我第一次见到，感到特别新鲜。

这次学习我最大的收获是充分意识到了科研管理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党校历史悠久，人才济济，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逃脱噩运，全国各级党校或停办或撤销。1977 年以后党校逐步恢复，中断了十年的党校，人才流失，校园丢失。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党校的教学和科研都受到较大影响。相比教学，党校的科研更加滞后，在全国社科界，党校的科研早期也没什么影响力。由于科研力量弱，党校的科研管理机构也普遍缺乏，管理人员相对较少。在学习期间，中央党校科研部有意给我们增加危机感和紧迫感，但更多的是给我们鼓劲儿，增加信心。我们在讨论中也感到，党校虽然有些底气不足，但发展趋势越来越好，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对党校高度重视，投入越来越大。

我明显感到，这次学习对我产生了极大的潜移默化的效果，我这一辈子为党校科研管理工作不断努力奋斗的意志，这时已经形成。

争取办会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在科研管理方面经受了一次全面锻炼，对科研管理工作充满信心。

1993 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央党校决定召开全国党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中央党校科研部向我们通报了这个消息，并说这次研讨会规格高、规模大，影响也会很大。据了解，好几家省级党校拟申请承办会议，像这样的会议，能促进党校的各项工作，提高党校的知名度。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在湖南办会应该是理所当然。但是，湖南省委党校经费极为紧张，除了发工资和购置必需的办公用品，所剩无几。我不敢自作主张，决定打电话请示一下。当时通讯很不方便，我晚上走到中央党校附近的颐和园邮电局申请打长途电话，等了约一小时，接通了当时湖南省委党校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张式军的电话，简单介绍了拟召开研讨会的情况，并请示要不要申请承办会议。张式军说要请示宁生同志（时任湖南省委党校校长），明天再通话。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颐和园邮电局，接通电话后，张式军马上急切地说，宁生校长要求全力争取办会，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湖南省委党校办会当仁不让。

有了校长的尚方宝剑，我开始底气十足地向中央党校科研部提出申请，列举了办会的优势和条件。中央党校慎重研究后决定，研讨会由湖南省委党校承办。这是我担任科研处副处长后，第一次成功申请办会，想到我们即将举办一次高规格的全国性会议，心里激动万分。

11 月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我拿着盖有乔石校长印章的红彤彤的毕业证书回到湖南，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办会工作。

到了筹备会议时，才知道工作有多难，最大的困难是没钱。党校的学员宿舍比较陈旧，如会议代表入住，必须装修；饭堂是老式建筑，也需要翻修一下；直接的办会经费也没有着落。校委对办好研讨会非常重视，专题研究了好几次。宁生校长说，我们要举全校之力，会议期间学员放假，全校集中力量办会，他还提议先拿出五万元装修厅干学员楼。这个楼是党校最好的学员楼，准备给会议代表住，五万元也是当时能拿出的最大开支。其他经费还没有着落，我非常着急，情急之下有了一个大胆想法。我找了一家大企业，希望他们给一些资助，回报是在会场上空飘悬有标语的大气球，以该企业的名义祝贺会议召开，实际是为企业做广告。我告诉企业负责人，这次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还有许多高层次领导干部，是一次难得的宣传企业的机会。协商一拍即合，双方都得到实惠。但我给中央党校科研部汇报时，科研部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政治性很强的会议，不能掺杂商业交易。

中央党校科研部可能觉察到我们办会有些困难，派了两位同志到湖南，了解会议筹备情况。两位同志回到北京后，向科研部做了汇报。科研部很快非正式地征求我们意见，如果我们有困难，他们决定委托上海市委党校承办。听到这个消息，想到从申请到筹办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顿时感到特别悲凉和难受。我再三向科研部解释，并说校委已下决心一定办好会，经费也在筹措。

后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对在湖南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非常支持，决定拨付会议专款。这让我们喜出望外，解了燃眉之急。同时，校委决定校内节省一点，挤出一些办会经费。尽管我们缺钱，但我们充满热情，不畏艰难。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代表们很满意。

2004 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央党校决定全国党校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我当时是深圳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有幸参与承办。两度担任科研处处长，两度筹办领袖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很是荣幸。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委党校）

我与中央党校

何处是乡关？

——解读国产纪录片《归途列车》

□余 青

还是从春运说起吧。春运场景是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开场白”。事实上，这部由一个个零散琐碎的镜头组成的纪录片没有旁白，是被一个关键事件串联起来的。这个事件就是每年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春运。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的春运那样，被演绎成一场几亿人在铁路、公路上的生死较量。五颜六色的雨伞下，涌动着一群神情焦虑、瑟瑟发抖、步履沉重的人们，他们的身旁，肃立着如临大敌的武警和保安在维持现场秩序。场面之宏大，声音之嘈杂，恐怕是不曾列入纪录的另一个世界之最。

影片纪录的四川籍农民工张昌华、陈素琴夫妇也出现在春运的大军里。他们的工作是生产带有“MADE IN CHINA”标签的牛仔裤，但是这似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给他们带来什么荣誉感自豪感。影片表现的是，光线昏暗、嘈杂凌乱的车间，在布料和成品堆里跑来跑去的孩子，在缝纫机旁酣然入睡的婴儿，就着一盘青菜吃饭的工友，还有夫妻俩住的狭窄出租屋。那肩膀上扛的沉重包袱、瘦削的身躯以及疲惫的面容告诉观众，他们为了挣钱，离家千里，过的是委屈、将就的不“体面”生活。这生活我们平时看不到，只有当他们出现在春运大军里，才走进公众的视线，却又让人不禁感叹：他们在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还只是个“异乡人”。


《归途列车》剧照

因此，春节回家有无可抵挡的意义。每到这时，他们步履匆匆，走出车间、厂房、工地以及各种劳动的场所，涌向火车站、汽车站或干脆骑着摩托车，头也不回地奔向日思夜想的家乡。不管坎坷泥泞，任凭翻山越岭，无论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千百万人回家的脚步。家乡的春节，才是他们每年必不可少的华彩乐章。难得一见的贵重礼物、含蓄的问候、殷切的希望和丰盛的年夜饭，还有必不可少的祭拜仪式，都蕴含着浓郁的亲情和乡情。这似乎就是他们千辛万苦去打工的动力，也是他们不远千里回家过年的理由。如果这就是归途的意义，那么他们在广州的辛苦、煎熬和忍耐都得到了报答。而事实说明，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情况正在朝着他们不希望看到的那样去发展。

起因在于大女儿丽琴。丽琴的成长本是为人父母的心头之痛——在孩子还在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们含泪扔下孩子去广州打工，让孩子沦为留守儿童，在缺少父母管教和关爱的环境下孤独长大。父母对孩子有歉疚，但离家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去打工，就是为了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可惜，他们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收入微薄、生存空间逼仄，还有户籍限制、申请学籍的麻烦等等，这些问题，本应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应该解决的，他们当然无从谈起。需要很久才知道，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孤独和绝望，需要很久才知道，父女之间、母女之间已经有多深的隔阂和陌生。女儿承担了那本不该由她承担的繁重田间劳动，还有那本该由成年男人出面的祭拜仪式。她成了缺少父母家庭的顶梁柱。花季女孩就这样被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忽略、轻视和牺牲了，徒然增长了她混合着愤怒倔强但又空洞茫然的叛逆情绪。青春在左冲右突当中失去了方向。她与许多同龄农家少女一样，向往着未知的城市，于是辍了学，与小伙伴一起，循着父母的道路偷偷地外出打工。然而，打工生活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更令人看不到出路。这愤怒最终以与父亲的肢体冲突方式释放了出来。在又一次返乡时，父母发现儿子的学习成绩出现了滑坡，商量着是否应该回来陪伴孩子，女儿却怒气冲冲地接了话茬：“你们要回来就真回来，不要只是说说！”与其说是为弟弟鸣不平，倒不如说为自己的缺失童年控诉。这场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个叛逆少女挑战父亲的权威，而是压抑在一位留守孩子身上的负面情绪总爆发，情绪失控的父亲动手打了女儿，更加剧了彼此的隔阂和矛盾。谁也没有料到，当初美好的愿望会变成如此残酷的报应！千里归途的意义顿时被抹杀了。

无论怎样，丽琴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回校上课，而是选择了到更远一点的深圳打工。在歌舞厅的工作多少让她感觉离现代城市近了，更自由了，或许会有更远大的前景？素琴在 2008 年全球化经济危机形势下，辞职回家陪伴儿子读书，丈夫张昌华一人孤独地留在工厂。两列相反方向的火车擦身而过，驰骋在中国大地上，城市还是乡村，何处是他们真正的归途？张家的故事也没有结束，这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依然徘徊在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之间。

纪录片《归途列车》的拍摄时间在 2006——2008 年间，历时三年，迄今为止，这是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纪录片。这部电影一经制作完成，就在国际电影界获得了一致赞誉，曾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洛杉矶影评人十佳影片大奖、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等 30 多个国际奖项，青年导演范立欣也被誉为中国纪录片第一人。

虽然距离影片拍摄时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但镜头把生活的原始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是令人感到了震惊。男主人公张昌华有着一张平凡但干净的脸，那张脸分明印刻着他被生活磨掉了精气神儿但又无奈苦撑的经历。他沉默寡言，与丈夫的沉默形成对比的是妻子不住嘴但又毫无意义的唠叨。这两个人物，是最普通不过的底层打工人，视角虽小，命题却很大，它受瞩目不是偶然的，当主流纪录片或停留在宏大叙事，或介入商业推销的时候，这部以零碎卑微的小人物生活为素材的影片，却触碰了城镇化进程的深层话题。好在政府已经动议解决户籍制度，提高打工人的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让打工群体享有与普通市民同等待遇。张昌华一家，还有许多像张昌华一家的人，应该不再继续每年都奔波在归途上了吧？

影视观察

德国政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

□郑 寰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访学期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不是高档奢华的生活方式，而是德国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发展，生态人居环境的便捷舒适。游览南德美妙的风光，阿尔卑斯山麓的青青牧场尽收眼底，田园村舍一片生机盎然，很难让人想象到巴伐利亚是德国工业经济的重镇，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德将近四分之一，拥有全德最多企业的地区。在对德国政党的大量访谈中，德国专家们屡屡强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巴州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核心，为基社盟长期稳固执政提供了坚实基础。从 1957 年开始，基社盟一直在巴伐利亚州长期执政至今，创造了德国政党的执政记录，这在德国 16 个联邦州中是绝无仅有的。在 60 多年的每次地方选举中，基社盟都保持了良好的选战成绩，表现卓越，令人瞩目。1974 年，基社盟得票率最高达到 62.1%，2013 年达到 47.7%，长期维持了单一执政的优势地位，有效地推动了巴伐利亚州的经济崛起。

在多党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基社盟何以带领巴州从一个贫弱的农业州崛起成为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工业州？在德国 16 个联邦州中，巴伐利亚公共投资排名全国第四，州政府负债率最低，财政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最低的，足以看到政府治理的效率和竞争力。更关键的是，在巴伐利亚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风貌得到了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巴州之所以取得成功，首先在于执政党抓住了历史战略机遇期，有效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基社盟和基民盟在执政时候就联合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即既不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道路，也不走社会民主混合经济的道路。这种经济思想受到天主教教义的影响，因此也被认为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它的核心在于强调市场经济中要充分体现“社会”的因素，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责任，保持企业发展和国家干预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低通胀率、良好工作环境、低失业率、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协调平衡。同时，东西德划分以后，大量政治难民和企业都迁移到巴伐利亚州，带来了大量优质劳动力和技术能力，为巴州经济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和产业结构。一些全球知名的工业制造企业，如西门子、奥迪、宝马等都将全球总部设在巴州，巴州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产环境和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巴州。在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担任基社盟党主席和巴州州长期间，巴州政府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用短短一二十年实现了巴州经济的腾飞和可持续发展，大大巩固了基社盟执政的合法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基社盟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得到了历任党主席的鼎力支持，具体的做法包括：

一是突破思想桎梏，破除狭隘封闭的发展理念。基社盟在建党初期被教权人士和狭隘的教派思想所控制，崇尚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一些早期领袖曾试图想把党员来源局限于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甚至敌视技术创新和现代化，认为会对传统带来破坏。在发展中，基社盟的领袖没有停留在空谈乡愁的层面，而是主动拥抱现代化。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敌视技术进步，对文明和文化持悲观主义，美化过去，逃避当前，都不能解决问题。要创造人道的工作环境和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要想进一步扩大对所有人的社会保障和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同时，“巴伐利亚政策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发展，我们的发展是符合人的要求的，是尊重造物主的。”施特劳斯在谈到基社盟在巴州的执政奇迹时，就说：“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我们有能力在传统与发展、保守与现代精神之间稳步地、令人信服地走自己的路。”具体体现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就是要既保持巴伐利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结构，同时又把它建成一个具有世界公认领先地位的现代工业地区。

二是贯彻“城乡等值化”的区域发展战略，着力破解城乡地区的巨大差距。基社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了“城乡等值化”的理念，其核心就是要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政策的协调，实现优质农村生活的目标。1965 年，巴州议会修改制定了《城乡空间规划法》，将“城乡等值化”确定为区域空间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求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工作及交通条件，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弱化城乡之间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巴州的“城乡等值化”绝对不是要把农村变为城市，而是尽量保留自然风貌，避免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巴州政府大幅度修改了原有的《土地整理法》《建筑法》，修编了原有的《土地利用规划》，在土地整理项目加入了土地生态占用补偿等条款，在村庄革新中强调了保护性更新和民众参与的理念，通过绵密细致的法律规范对保护乡土进行了硬性约束。

三是科学开展空间规划与产业布局，根据人口和产业的动态预测，按照“集中分散”的原则进行国土规划和产业布局。为了实现区域协调的目标，巴州政府引导将优秀的州立大学和政府机构搬迁到相对不发达地区，以学校和政府带动周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优美的农村生态景观，提供便捷优质的生活环境。为吸引资本技术下乡，把宝马汽车公司等大型企业也分散布局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以点带面规划布局道路建设和环境生态，在公共决策之时，悉心倾听产业界和当地居民的意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为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十分优良的环境。政府大力投入信息化网络和道路学校建设，为企业打造优美舒适的生态环境，逐步配套周边生活生产设施，充分考虑到了企业和当地居民便捷生活的需求。

四是保护乡土文化，打造旅游生态景观。优美的生态景观是乡村吸引力的根源所在，乡土风貌及其文化一旦遭到破坏，乡村也就失去了其独有的魅力。基社盟所推动的并不是简单的小块并大块，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最终目的的狭义土地整理，而是活化土地文化，保护乡村自然风貌为宗旨的土地整治。因此，巴州的村庄革新和土地整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中心保护当地的建筑和文化，综合一体地提升乡村的吸引力。森林遍布的巴伐利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仅 2005 年，巴伐利亚州就吸引了 2380 万人到巴州旅游，创造了 7050 万人次的留宿记录，占到了全德旅游总比的四分之一强，为巴州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就业岗位和经济收入来源。

五是推动中小企业在农村落户，促进农村人才就近就业。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德国农村也一度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为此，基社盟为了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着力促动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农村人口的就近就业，将人才留在农村。在巴州制造业企业里，有 95.1%的企业是雇员少于 500 人的中小企业，贡献了超过 51.4%的就业岗位和 39.7%的财政收入。这些中小企业大多数布局在农村地区，城乡之间便捷的物流渠道将这些小企业与全球客户联系起来，完备的供应链条、物流设施、能源基础和市场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支撑，也活化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同时，巴州政府尤其重视职业教育，采用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优质的技术工人。公平优厚的工资待遇为农村人口就近就业创业提供了便捷条件，很多人都选择留在农村。正是这一系列的城乡区域发展协调的重要举措，使得巴伐利亚州成为全德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而这也正是打开基社盟长期执政之谜的钥匙。

寰球纪行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 88 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